

* 文哲論壇 *

再論《左傳》與《國語》的關係*

王靖宇**

《左傳》與《國語》二書既非由一書化分而成，亦非爲一人所作。此一結論，在學界似乎已取得公認。儘管如此，二書間顯然也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根據張以仁教授兄的統計，二書記事重出部分幾乎佔《國語》三分之二的份量。這些重出部分固然有時的差異、地的差異、人的差異、事的差異等等，而且詳略也不一，但重要的是，二書所敘事件相同，而且有時甚至連語句也完全一樣。^①關於此一現象，學界「比較公認的解釋是：它們各自獨立成書，《左傳》晚於《國語》，參考了其中的史料，甚至有些傳文可以看作是對《國語》記載的直接改編，但《國語》……只是《左傳》成書時所參考的眾多史料中的一種……。」^②

筆者在〈從敘事文學角度看《左傳》與《國語》的關係〉一文中，^③曾試圖通過對二書中都有記載的「申生之死」事件的詳細比較，論證二書不可能由一書化分而成，也不可能爲一人所作。不過因爲二書在敘述申生事件時有許多細節很接近，有時甚至連文字也完全一樣，所以在文末也曾對二書間可能存在的關係作過探討。結論是，這種現象的發生可能有三種解釋：(一)二書所採用的原材料相同；(二)《左傳》的編著曾參考並採用過《國語》；(三)《國語》的編著者曾參考並採用過《左傳》。在這三種解釋中，第一種的可能性較高，但可惜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發現當時二書所依

* 本文曾於民國 85 年 9 月在臨淄召開的「春秋經傳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宣讀。

** 本處諮詢委員，美國史丹福大學亞洲語文系、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① 參見〈論國語與左傳的關係〉，載《國語左傳論集》（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 76，103；〈從國語與左傳本質上的差異試論後人對國語的批評〉，載《春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 116。

②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 376。

③ 載《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6 期（1995 年 3 月），頁 1-30。

據的原始材料，所以無法加以證實。第三種解釋的可能性不大，因為總的來說，《左傳》敘事比較緊湊而有條理，相形之下《國語》有時就顯得散漫零亂。在先秦時期書寫條件並不方便的情況下，很難想像會有人去把一個原本寫得完好的故事改寫得支離破碎起來。這就剩下第二重解釋，即《左傳》作者在成書過程中，曾參考並採用過部分《國語》上的材料。根據文中對二書裡申生故事的比較和分析，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換言之，在這裡我和前段末所引一般學者的看法是一致的。

不過，我上面對《左》、《國》二書間可能存在的一些關係的推測，也只是就「申生之死」一個事件而言。如果我們將二書拿來作一更全面的比較，即不難發現，情況恐非全然如此。一般來說，《左傳》行文固然較《國語》精簡而富條理，但也並非全無例外，「王子頹之亂」一段的敘述便是一個好例子。現將二書中有關此一事件的記載排比如下，作一比較：

《左傳》④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葛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葛國之圃以爲圃。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葛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莊公十九年)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莊公二十年)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莊公二十一年)

④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修訂本)，第1冊，頁212-217。

《國語》⑤

惠王三年，邊伯、石速、蕩國出王而立子頹。王處於鄭三年。王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樂及徧舞。鄭厲公見虢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三大夫，王乃入也。（《周語上》）

從「王子頹之亂」事件來看，《國語》裡敘述顯然較《左傳》精簡。《左傳》用了一整段的篇幅來說明周惠王被逐以及王子頹被立的經過，而《國語》則只用了二句話來交代：「惠王三年，邊伯、石速、蕩國出王而立子頹。王處於鄭三年。」接著是「王子頹享大夫」一節，是《國語》敘述的主要部分。這一節在三書中長短相仿，內容也大同小異。再接著是周惠王在鄭厲公和虢叔的協助下復入周殺王子頹的情節，《國語》裡的敘述又較《左傳》簡短扼要。張以仁教授在〈孔子與春秋的關係〉一文中不同意《左傳》中「君子曰」部分乃劉歆據《史記》所增，並說：「而且就一般情形來說，多半是由繁刪簡易，由簡增繁難……」⑥本此，就「王子頹之亂」事件而言，則《國語》的編著者在成書過程中曾參考並採用過《左傳》的可能性也就不能排除了。

既然《左》、《國》二書彼此均有曾參考過對方的可能，我們便無法斷定何者在前，何者在後。面對此一可能，我們就不得不重新認真考慮上文所提第一種解釋——即二書所採用的原材料相同。此一解釋，固然由於到目前爲止尙未發現二書當時所依據的原材料而無法加以證實，但如將二書中均記載相同事件作一仔細比較和分析，仍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⑦下面試舉一例來說明。

秦穆公聽信了秦國派往鄭國駐守的杞子的話，不顧蹇叔的勸阻，派兵襲鄭。但

⑤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上冊，頁28-29。

⑥ 載《春秋史論集》，頁24。

⑦ 張以仁教授在注①所引〈論國語與左傳的關係〉一文中，對二書之密切關係亦曾有假設：「那便是二書採用的材料相同。不同的兩部書，各就該書的需要，同時採取相同的或不同的材料，這種情形一點也不足爲奇。」（頁89）不過因爲他的論文主要是要證明二書非由一書化分而來，亦非爲一人所作，所以並未再特意對此假設加以發揮。

後來又不果而返，於途中經過晉地峭時，遭到晉軍的襲擊，三帥被俘。下面是二書有關此一事件的記載：

《左傳》^⑧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有、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僖公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斷，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

^⑧ 《春秋左傳注》，第1冊，頁489-491；494-498。

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

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僖公三十三年)

《國語》^⑨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皆免冑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譴。」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克，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譴，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峭，獲其三帥丙、術、視。(《周語》中)

上面所述事件也許可以簡稱爲「秦師襲鄭」。乍看起來，和前文所見「王子頹之亂」一樣，《國語》有採用《左傳》的可能，因爲前者很清楚要比後者簡短得多。《左傳》一開始即用了一長段來敘述秦穆公決定襲鄭而遭到蹇叔的強烈反對的細節，而《國語》則僅以「秦師將襲鄭」一句輕輕帶過。秦師過周北門之後，《左傳》先後以五段篇幅敘述秦師何以決定放棄襲鄭計劃而班師回國，而在經過晉地峭時又遭到晉軍的襲擊，致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被俘；《國語》則只用四句話加以總結：「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峭，獲其三帥丙、術、視。」只有「秦師過周門」一段，二書敘述長短相仿，內容大同小異，措辭也頗有雷同之處。

但如果我們把二書中均有比較詳細敘述的「秦師過周北門」一段拿來仔細對照和分析，則《左傳》又似乎曾有參考《國語》的痕跡，因爲事實上前者在文字上要較後者簡潔有力而且富有邏輯性，似乎是在《國語》文章的基礎上加工而成。首先，《左傳》裡沒有了《國語》第四句裡「皆」和「拜」，我們看到的只是「左右免冑而下。」「皆」字在這裡可以說是多餘，因爲從上下文不難看出，這裡所謂的「左右」應當是多數。「拜」字的刪除則除了簡潔的考慮之外，還有加強語意的效果。《國語》裡的秦師固然表現得輕慢無理，但至少還有「拜」的動作，而《左傳》裡的秦師既然沒有「拜」的舉動，當然就更顯得「輕而無禮」了。《左傳》後來在「王孫滿」下面還多了「尙幼」二字，這固然可能符合史實，但在這裡特意點明王孫滿的年紀，這就可能也是爲了加強全部事件的語意：秦師的表現的確太過份，連一個尙未成年

^⑨ 《國語》，上冊，頁 60-61。

的人都看出來了。

再看王孫滿的一番言語。在《國語》裡，他一開始就把他觀察過秦師後的結論說了出來：「秦師必有讎。」由於此一說法突如其來，是以引起周王的驚愕與好奇，不免問道：「何故？」王孫滿這才慢慢將他的意思說出來，一方面從「輕」推論到「寡謀」再推論到「自陷」；另一方面則從「驕」推論到「無禮」再推論到「脫」。因此他判定秦師「入險而脫，能無敗乎？」如果秦師不出差錯（「讎」），那就是「道廢」了。

反觀《左傳》：第一，因為王孫滿並未一開始即提出自己對秦師的看法，而是先指出實際情況（「秦師輕而無禮」），然後才下斷語（「必敗」），聽者容易理會，是以周王並未反問，這就省卻了一些對總體語意並無大影響的文字。第二，王孫滿未用「讎」字，因此就不必像在《國語》裡一樣，因為先用了「讎」字，接著又用「敗」字，所以於「入險而脫，能無敗乎」之後，還得再加上「秦師無讎，是道廢也」兩句，好回應到當初「秦師必有讎」的論點。第三，王孫滿未用「驕」字，因此便不必輾轉再由「驕」而推論到「無禮」，而是直截了當地說「秦師輕而無禮。」接著他由「輕」推論出「寡謀」，由「無禮」推論出「脫」，然後簡潔清晰而富邏輯性，立論也十分縝密。

所以，純粹從文章的角度來看，《左傳》至少在對「秦師過周北門」一節的處理上應當說是勝過《國語》的。如果二書間果真存在著相互參考關係的話，那麼，依常理判斷，應當是《左傳》在參考《國語》，而非是《國語》在參考《左傳》，因為《國語》編著者似乎沒有理由，在先秦書寫條件並不方便的情況下，甘冒添足之譏，將本已寫得相當精緻的一段改得不必要的冗長了。準此推論，則《國語》編著者在撰述「秦師襲鄭」事件時曾參考過《左傳》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了。既然如此，則《國語》在事件開始時所謂的「秦師將襲鄭」以及在事件結尾時所謂的「秦師還，晉人敗諸崤，獲其三師丙、術、視」等資料又來自何處呢？我們恐怕只能說是《國語》另有所本了。再反過來說，如果《左傳》編著者在撰述「秦師襲鄭」事件時果真如上所述，曾參考過《國語》，那麼在「秦師過周北門」之前和之後多出的一些細節又來自何處呢？我們恐怕也只能說是另有所本了。不但如此，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左傳》所根據的材料也就是《國語》所根據的材料，因為在「秦師過周北門」一節的敘述上二者在文字上委實太相近了。

總的來說，《國語》似乎以記言為主，^⑩而《左傳》則以記事為主。從上面我們看過的「王子頹之亂」和「秦師襲鄭」兩個事件就不難看出，《國語》在記載前一事件時主要是要突顯鄭厲公的一段話，而在記載後一事件時主要則為突顯王孫滿的一番說辭。因此，《國語》編著者就不像《左傳》編著者一樣，還把每一事件的來龍去脈也交代清楚。不過，《國語》也不是一味的記言，像「申生之死」、「重耳出亡」等有名段落，其敘述之詳盡，較之《左傳》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何以後人仍多以史書來看待《國語》，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即曾大量使用過其中的材料。也許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結論：一般來說，《國語》編著者在採用原材料時，似乎主要是轉抄，並未對所轉抄之材料再特意修整或加工，^⑪所以可以說《國語》比較接近原材料的原貌。《左傳》編著者則不同，在使用原材料時曾作過精細的篩選與修飾工作，所以全書的風格較一致，可以看出基本上是一個人的作品。正因為如此，當二書在記事有重出部分時，就容易使讀者產生錯覺，以為是《左傳》在採用《國語》。換言之，即以為是《國語》在時代上較《左傳》為早，乃後者所參考過的原材料之一。

^⑩ 參見注①所引張以仁教授之〈從國語與左傳本質上的差異試論後人對國語的批評〉一文。

^⑪ 參見注①所引拙文。